Globethics Repository



后人类主义技术价值观探究 [Probe into Post-humanism s View of Value in Technology]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佘, 正荣
Publisher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
Rights	With permission of the license/copyright holder
Download date	2026-11-13 05:47:28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82407

佘正荣：后人类主义技术价值观探究

佘正荣

摘要：后人类主义的技术价值观企求通过利用生命技术、人工超智能等高技术来实现人性的改良，使人本身在健康、智能、寿命、幸福等方面实现没有限度的自由发展。由此产生了人的存在与技术发展关系的复杂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本文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较为切实和深入的探索。

关键词：后人类主义 技术价值观 人的存在与技术的发展

〔中图分类号〕N0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763（2008）01-0095-07

后人类主义（posthumanism）是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尤其是最后10年以来，美国、欧洲、澳大利亚等西方富裕国家的科学家和学者，以大脑科学、神经药理学、生物克隆技术、基因修复技术、直观人类工程、人工超智能、人体冷冻技术、纳米技术、太空技术等的新发展为基础，希望借助于这些技术的巨大潜力，逐步改造人类的遗传物质和精神世界，最终变人类自身的自然进化为完全通过技术实现的人工进化的社会思潮和实验性探索活动。尽管后人类主义的主张和试验已经被许多严肃的学者看作是一种对高技术的盲目崇拜，是一种只具有科幻艺术形式而不可能真正实现的极端的科技乌托邦。但是这些主张和试验，已经给当代人类造成了比克隆震撼更为剧烈的不安和恐慌。由于后人类主义的基本思想主要是建立在其技术价值观的基础之上，因此本文主要围绕其技术价值观的维度进行分析，以探索这种技术价值观引发的一些理论难题和极其复杂的现实问题，并且由此得出一些重要的警示。

一、高技术的后人类景观

后人类主义者是致力于探求如何成为后人类（posthuman）的那些人。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马克斯•莫尔（Max More）、雷•库尔思韦尔(Ray Kurzweil)、开尔文•凯利(Kevin Kelly)、 彼得•斯诺德谛克(Peter Sloterdijk) 、基思•安瑟尔•皮尔森(Keith Ansell Pearson)等。这些人认为，人类现在正处于通过高度发展的科学技术，尤其是技术科学开始把人的自然进化推进到超越当前人类的“超人类”（transhuman）时期，而人类进化的未来则属于后人类。超人类正是人类利用高技术进行大胆的进化尝试，为进入后人类作积极准备的 “过渡时期的人类”。尽管超人类是后人类的低级版本或初期阶段，但他们通过基因治疗、神经益智药的使用、器官和生殖克隆、人工智能、人的身体皮下植入计算机芯片等技术的应用，已经极大地减轻了人类的疾患，衰老和过早死亡的生物限制，而且在身体的功能和智力上得到了极大的增强，甚至使人具有双性性格、无性生殖的身体和分布式的身份。[1]这些通过技术改进而获得了新能力和新特征的超人类，正在人类通向后人类的进化过程中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

后人类指的则是已经完成了从自然进化到技术的人为进化过渡的人类，他们虽然是人类的后代，但是已经进化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他们不再是人。这些后人类的存在物在体能、智能、力量、记忆、健康、幸福和寿命等所有方面，必将远远超过目前的人类。在后人类主义者看来，人类只不过是从猿进化到后人类的一个过渡的中间阶段，而现在人类正在利用高技术进行系统的进化，并开始在智能、信息、生命、秩序和自由上全面超越人类。根据马克斯•莫尔在《论变成后人类》一文中的看法，后人类所追求的理想目标，可以通过两种途径获得：在物理上，可以通过科学技术的方法获得；在精神上，可以通过操纵文化的记忆来引起人的动机结构的改变来获得，其中包括改变和提高对情绪的控制，对性欲倾向、强度和频率的控制。[2]按照有关文献提供的描绘，后人类主义的这两种途径的实现方式大致情况如下：在人的物质改造方面，现在的超人类主义者已经可以借助于人类完成的基因图谱，利用人类基因工程和生物

克隆技术，对人种进行改良。目前，人类已经发现了导致人类各种功能和性状表现的遗传物质，人们可以在人诞生之前，对这些物质进行基因修复和基因组合，以制造出我们所需要的理想状态的人。例如，通过可遗传的基因改造技术和生殖技术，人们可以选择子女的性别、身高、体格、容貌、寿命等生理特征，产生出人们所希望的完美后代，甚至还可以选择不同职业的能力倾向，如选择政治家、科学家、艺术家、商人、军事家、学者等素质，通过技术的人工过程来订制优生学上的各种精英人物。人们甚至可以从其他动物的基因中剪切一些自己需要的基因片断，而与人类的基因进行重组，以改良后代的身体功能。在人的精神改造方面，超人类主义者也认为，可以利用大脑神经科学和人工智能及计算机信息技术来极大地提高人的生物智力。通过神经学界面和计算机接口的接入，人的认知模块和心理状态可以通过上载到网络上，从而实现与其他大脑的整合。由此，人们可以迅速获得通过在网络上运行而提升的这种合成智力，它是一种远远高于人的天然智力的超智力。通过上载，一个人可以很方便地获得各种精深的专业知识和能力，而无需进行长期的学习和培训过程，便能立刻达到各种专家的知识水平。例如，如果我想对晦涩难懂的科学文献进行翻译，或者对复杂的数据进行大量的计算，只要通过上载而获得一个翻译和计算的认知模块，然后在因特网上运行，使之整合于自己的大脑模块中就行了。另外，在人的心理状态上，也可以通过将自己的心理模块上载到网络上，与心理状态优良的模块进行融合，由此就可以获得一个健康心理系统的结果。显然，通过物理和精神两种途径实现的后人类存在，实质上是人的生物形式和电子形式的技术合成物。这种复合性的后人类存在物的表现形态具有从机器人（robot）到生化人（android）和电子人（cyborg）的发展经历。由于早期提出的机器人是由做复杂工作的人型机器发展而来，而且带有被压迫和被歧视的工人、外来雇员的色彩，因此，机器人后来就被生化人和电子人所代替。生化人是由生物材料做成的人形自动机，它来源于炼金术士试图创造出人的想法，并且与犹太教神话中“有生命的假人”有关。电子人最初则被设想为具有自我调节能力的复杂的人机系统。“不像流行的机器人概念那样，生化人和电子人在流行的文化中被看作与生物的和科技的起源性质有特殊的联系，因此它们超越了先前的、密封的、被坚持的界限，如文化和自然，生和死，生物和机器，真正的和合成的之间的界限。”[3]由于生化人和电子人具有自然的身体与文化的技术融为一体的特征，不像机器人主要是控制论的电子信息与机械设备组成的单一技术的人型存在物，因此，后来超人类主义者就倾向于用生化人，尤其是用电子人来表达更为合适的后人类的存在形态。当然，电子人也有一个技术进化过程。它开始是借助于网络来联系和提高自己的智能和心理，但通过人工智能的发展所建立的“蜂房心灵”（个人的心理被归类到人工智能的分布式系统），将来可以发展出“从思想到思想”的那种心灵感应式通讯，即在精神上达到思想与思想的直接沟通，以至发展到成熟时期就可以完全超越身体的物质束缚。最后，通过与太空技术的结合，电子人将超出地球空间而移民到广袤的宇宙中去求得无限的发展。后人类主义根据现代科学技术的发现和它所憧憬的理想未来，给人们描绘出了一幅后人类的非常诱人的美好图景。后人类主义深信，利用不断发展的神奇技术，人们不仅可以永久性地解除疾病、衰老甚至死亡所加给他们的身体和心理的各种痛苦，超越物质时空的限制，而且能够超越任何生活、智力、快乐和自由的终极限制，达到追求无限的快乐和永恒的持续进步的生活，建立起不断进步的生活标准和尘世中的天堂。这种连上帝也只有在天堂中才能做到，也许连上帝也根本做不到的事情，后人类主义者却相信能够通过理性和技术的不断进步在现实中就加以实现。

二、后人类的技术价值追求与存在论超越

后人类主义对没有任何限制的永恒进步的未来的价值追求，建立在激进技术主义对高技术无限进步的信仰之上。它反映了现今西方许多主流科学家、科技企业管理人物，高技术专家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情况下对人与技术关系的一种理解。这些主张中的确存在着一种科技乌托邦的愿望和幻想，但在这里也同时提出了一个通过技术手段，是否能使人类超越自身自然规定的限度问题，而这种超越又是否合理的问题。这样的问题以人类医学中修复与增强的争辩直接地表现出来。人们通常的看法是，医学的治疗过程是一个修复的过程，即借助于医学技术手段，对人的身体疾病进行治疗，以解除人的痛苦，把人的健康状况恢复到正常的功能水平。而增强则是通过医学的或其它所有的技术手段，把个人的能力提高到超过所有人的正常能力的水平之上。

通常人们会认为，修复是应该被允许的，而增强是不应该被允许的。因为修复被允许是出于人道的考虑，而增强不被允许是为了阻止不公平的社会竞争。但后人类主义则如此争辩说，修复和增强的界限常常是很难准确区分的。例如，当一个年轻的女孩通过整容医术不光治好了她的面部的创伤，而且获得了超级美丽的容貌，同时还给她带来了职业（如演员、节目主持人、秘书等）竞争的生存优势，只要她能适应新的生活，就没有什么理由认为不可以这样做。进而言之，如果人们通过各种最新的技术，不仅获得了超级美丽的外貌和超级体能，而且具有了超人类的高智能，这必将极大地提高这些人的生存优势，那又有什么不好呢？通过利用各种高新技术，使超人类的体力和智力超过人类的体力和智力，从而由人类阶段进入到后人类阶段，就像过去人的能力超过猿的能力一样，既是必然的，也是我们应该积极追求的。后人类主义对修复和增强的观点，隐藏着一个更深的也更为核心的价值取向，那就是人类利用技术的进步对人类本身的超越是符合事物进化的规律的，也是合理的，人性的人工进化应该取代自然的进化。从人类技术自身的发展来看，似乎也存在着这样的必然趋势：人类最初利用创造工具的技术改造外部自然界，而将自己与动物区别开来。进而人类又把身体的形状、结构和功能作为身体器官的延长或器官的投影去发展技术，使工具和机器发展到一个非常复杂的阶段，于是把技术对外部世界的改造从宏观世界扩展到宇观世界和微观世界。当技术发展到更高程度时，它又转而对人类自身的内部自然进行直接的改造，从形态改变、功能提高到遗传改造和人性优化，直至通过自然和技术的综合协调最终实现完全人工的控制，彻底接手自然进化，取代作为造物主的上帝，使人最终也成为技术的发明物。但是，即使存在着这种技术进步的趋势，这些技术上能够做到的就是应该做的吗？人类可以通过技术跨越人类生命的自然进化阶段吗？后人类主义的回答是，虽然自然的进化创造了我们人类，但是它也给人类设置了一些不可能自然地超越的限制，如DNA的遗传镣铐强加给我们体能、智力和性格上的各种限制。就像通常的治疗技术是一种改变人类的技术一样，通过基因工程来改变人类的技术也应该被视为人类存在的构成成分。因此，人们应该通过积极地发展技术来自己控制进化，主动掌握、规划和选择自己未来的能力，不然就无法达到适应性的顶峰。当然，通过技术干预方式而创造的后人类对于自然进化的方式而产生的人类，的确是实现了存在论上的超越。这种存在论超越，不仅表现为二者在身体的解剖学结构、基因品质、物种类型的本质差异，而且表现为二者在生存方式和生存能力上的本质差异。由生命的自然进化方式而产生的人类，在本性上是相关的同类。然而，如果随着基因修复、基因合成等遗传技术和控制论的皮下植入技术发展能够制造出优选的人类后代来，那么通过技术的遗传干预产生超人类存在和后人类物种与我们现在的人类物种的存在论差异，将会导致一系列严重的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因为，现代生物医学技术利用人类直观工程和人类基因图谱，把不同存在论的存在本体因素进行杂交与组合，人与动物在技术过程中的可交换性实践，已经不能确保人类的自身同一性与自我认同和优越地位。人与非动物在宏观解剖形态上的明显区别，本来是由各自微观的遗传信息的不同来保证的。现在，人们开始利用动物与人类基因的开放性来进行杂交生殖，把动物和人的基因加以合成，完全有可能产生出狮身人面、牛首人身等许多的怪异生物来，这就必然导致人的尊严受到严重的威胁。再者，即使我们排除了人类的基因同一性与产生表现型的怪异生物问题，假设通过技术干预产生的后人类是一个在外形上与人类非常相似的物种。但是，在经过技术处理使得体能和智力得到极大增强的条件下，后人类毕竟是与自然进化不相同的一个更具有竞争性的生物物种。后人类的竞争优势必然使得它获得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的优势，而导致自然进化产生的人类沦为二等人类。那些有经济条件和科技实力的民族和国家，将会利用所有高科技成果进行人种改良和人的能力增强，使高科技条件下的优生学革命成为事实。随着后人类种群的发展，原来那种纳粹主义的种族歧视将会重新得势，并且发展为后人类物种对现在人种的歧视和仇恨，那将造成不同民族、国家和整个人类生存局面不可想象的混乱和恐怖状态。所以，即使人类能够走向后人类，也不应该冒失地跨越人类生命产生的自然阶段。

三、人的存在与高技术的发展

对后人类所主张的在人本身的生殖方式方面和智能形成方面以人工进化取代自然进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后人类对人类的存在论超越的仔细分析，必然会使我们在高科技发展的今天，重新思

考如何看待人的存在、人与技术的关系、人应该如何调控技术等一系列复杂的理论问题。我们今天的人类是否应该由技术所创造的后人类来取代，实质上取决于我们如何更深刻地理解人的本质。自十九世纪以来，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人类没有由自然遗传因素决定的本质，而只有作为社会存在物的社会本质，人是由社会关系决定的存在。随着20世纪生物科学的发展，尤其是遗传学所取得的重大科学成就，有不少生物学家和学者认为，人性或人的本质，是由人的遗传因素决定的，而且这些因素决定了人类社会道德的基础。这就产生了人的本质是遗传决定还是由社会教育和环境影响决定的不同看法。在现代技术对人类遗传的干预可能影响人类未来的生存前景的情况下，对人的本质的不同看法，从逻辑上将导致对人类的人工进化抉择采取不同的态度。福山认为，强调人的本质是由社会决定的人，应该并不在乎人类利用一切技术对自身的遗传素质进行改变。而强调人的本质是由遗传因素决定的人，就必然反对利用基因工程和其它后人类技术对人的自然遗传因素进行变革，也就必然坚决主张对这些技术进行限制，以避免人类共同的行为规范丧失共同的生物学基础。福山本人也认为，“人类本质是代表人种的行为与特征的总和，起源于基因而不是环境因素”。[5] 事实上，福山的这种看法具有合理性的一面，但又有将人的本质简单化的缺陷。如果说，人的自然的遗传因素对人的疾病、智力类型和一些性格倾向，对人的后天的这些方面有较大的影响，那末，这些因素并不能单方面地决定人在其社会经历中形成的全部复杂性，更不能完全决定人类行为的道德基础。全面地看，是自然的遗传因素和后天的社会存在环境一起决定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的社会本质，而不是某一个方面单独决定的。在这两类因素中，社会因素对人性塑造的作用要更大，也更为基本。在不同的文明发展程度、文化差异下教育出来的人，在其社会道德和能力方面必然存在着那个社会的决定性影响，如在发达的美国和经济最贫穷的非洲国家长大的人，其社会差异必然很大。在狼群与熊窝里，即使最具自然天赋的刚出生的人类婴儿，也不会自然地发育成长为人，最多只能成长为具有人型的“狼孩”、“熊孩”。因此，人的本质和人性是由人的生物遗传性与社会性教育过程共同决定的，而后者起着主要的作用，但遗传因素也对人的素质起着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在相同的社会文化环境里，遗传因素占优势的婴儿，一般会成为社会中更为优秀的个人。这样，规定人性变化的两个基本方面就对人类文明的进程发生着一些非常复杂的影响。今天，在人类的技术可以直接干预人的自然遗传因素的实体的条件下，人的自然进化的遗传品质的纯度已经受到高技术带来的污染。生命本身最为内部、最具有隐秘深度的自然也成了与技术纠缠在一起的自然，一如人类以前改造过的外部人工自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类所选择的技术决定的自然。不同的是，在我们利用技术与外部自然遭遇时，我们是在用技术来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服务，因而这种选择较易做出。在我们通过技术来改变人的遗传物质时，我们所遭遇的则是我们自己，即我们要选择一种什么样的人类未来的存在形式。这时我们的选择就非常难以决断。因为这时人与技术的关系，就是人对待自己存在的直接关系。在这种技术中，人与自己的存在最深处的秘密遭遇，对这种技术的选择就是对人类存在的意义、人类未来的生存前景这些根本价值的选择。在人类的自然产生的方式中，人在出生之前，自身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与技术是完全分离的。但在人的技术产生的方式中，人在孕育之前即被基因技术“拆开和重新配置”，像机器一样被进行装配制造，人出生之前的完整统一性就被技术所破坏，并被技术规定其存在的物质条件。正是由于高技术可能改变我们人类存在的遗传品质、精神和性格等人性本质，所以对待这种技术就不是改造外部的一种存在者的显现，而是规定作为此在的我们，如何存在的方式，而不能等同于一般存在物的显现。这就必然突出被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技术观所忽视和贬低的两个规定：技术的工具性规定和人类学规定，尤其是技术的工具性规定要服务于人类学规定的价值目的。由于这种局限性，海德格尔将技术视为存在的命运，而低估了技术的人类学维度的意义，忽视了对技术进行政治、道德和法律评价，进而调控技术发展的可能性，而他只是主张被动地倾听存在的天命，通过“冷静”和“思”的方式来等待存在天命的拯救。[6] 从社会与遗传的关系来看，通过基因工程，随便变更未来子女的遗传结构，而且以人的遗传物质做实验，这就改变了人作为适应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存在性质，也超出了社会许可的个人权利和父母权利的观念，超出了社会长期以来默认的习惯的人的再生产的方式。即使存在充分的理由要利用某些技术，以消除人们的疾病、痛苦，满足人们必须通过这些技术来实现的利益和目的，也必须首先要适应人类社会的价值体系和与此相关的各种社会文化规范。因此，对我们人类自己发明的技术，无论是对于改革外部世界的技术，还是改变我们人类自身的技术，都要进

行诊断性的评价，然后加以调控，尤其是对后者需要高度重视。放任技术完全自由地发展，不仅是对世界不负责任的态度，而且更是对人类自身不负责任的态度。对高技术的管理和调控的需要，使我们必须把人的本质的思考与技术评估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律学、伦理学等社会规范体系和改变人类的高技术本身结合起来统筹考量，从而走向一种调控高技术发展责任的规范性研究。这些研究具有一种跨学科的综合性质，它要我们承认应用于人本身的新技术，既有对人有利的方面，也有对人的不利方面，更不能否认长期隐匿着的威胁人类生存的巨大风险，以便确定这些高技术中的哪些具体内容和哪些方面需要禁止，哪些可以允许发展？它们的合法性标准又是什么？高技术发展的完整的规范体系如何建立？从而帮助人们确立高技术发展的适宜政策和法规体系，以便把高技术的发展置于人类的安全控制之下。

四、高技术调控的实践难题

虽然我们不赞同后人类主义的技术价值观，不支持对人类进行人种改良的探索性试验，以避免产生后人类物种对人类的生存威胁，但是我们也不主张完全禁止大脑科学、神经药理学、生物克隆技术、基因修复技术、直观人类工程，人工智能、人体冷冻技术、纳米技术、太空技术等的发展。而是要使这些高技术的发展为人类的生存利益服务。在实践上要避免或者支持对人类改良的实验，或者完全禁止高技术发展的两种极端的态度和行为，实现对高技术的有效调是控，的确是非常令人困惑的难题。主张后人类主义的大都是一些有名的科学家、生物伦理学家、生物技术企业专家，他们属于西方主流文化领域，而非仅仅处于文化的边缘地带，这些人对后人类主义的竭力宣扬和在高技术上的各种试验，在意识形态的意义上已经导致了后人类主义的现实存在。同时，由于后人类的技术尝试存在着巨大的商业潜力，要想完全控制或阻止它的发展就几乎是不可能的。更何况这些技术代表着西方发达国家富裕阶层的利益，这些富人不仅希望稳定自己物质财富的优势地位，而且希望成为“基因富人”来加强自己对于贫穷的社会阶层和发展中国家的这种优势地位，这就有可能由用户至上的经济需求鼓励激进技术自由主义去把生殖性克隆、遗传前基因疹断与基因组合技术、神经药物、人体冷冻技术、皮下芯片植入等后人类的技术加以市场化，而当这种努力与西方发达国家企图保持与发展中国家在科技上的巨大优势的目的相一致时，即使有一些学者从人类生存危机的担忧主张调控这些技术的发展，但在实践中也就很难加以有效地进行实行。从技术服务于人类生存和健康的目的的意义上讲，简单化与极端地主张和反对人类生殖和功能增强的技术的使用都是片面的。一些伦理学家和宗教人士出于对优生学和新的种族歧视的担心，认为即使干细胞克隆技术、基因修复技术等能够减轻和根治千百万人的巨大痛苦，也要永久性地禁止使用这些技术。而技术进步论者和后人类主义者则主张，所有高技术都有利于人类的健康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经济的发展，即使这些技术存在着一定的风险，也不应该设置禁令，而是应该让这些技术在尽可能少的限制下去自由发展，去解决自己的问题。我们认为，对于有利于人类健康的器官克隆、遗传疹断和基因修复，可以审慎地、负责任地、有限度地加以利用。而对于生殖性克隆、可遗传的基因改造等可能导向优生学灾难的技术，则应该加以禁止。必须充分认识到，低估高技术的潜力可能对人类生存的威胁是非常危险的，尤其是将它用于我们人类自身的身体、精神和情绪等人性的基本方面的时候。因此，在没有把握对这些技术进行有效管理和控制的时候，我们就应该立即延缓甚至暂停这些技术的发展，直到我们想出可靠的对策、措施，找到有效的调节规范为止。同时，这些用于人类本身的高技术，又具有其自身难以控制的复杂性特点。就其运用的对象本身来说，正如我们已经指出过的一样，在人的健康的修复治疗与智力和功能增强方面，存在着难以区分的界限问题。就技术所涉及的物质资料和设备来看，它们又都规模较小，不像原子能技术那样容易发现和管理。就其结果的显现来看，它又具有长期的隐蔽性和滞后性，这些技术产生的后果很难发现，一旦发现，可能已经造成难以挽回的重大灾难。就其开发和使用这些技术的主体（尤其是职业群体）来说，他们的动机和目的性极为复杂，有医疗的、经济的、政治的，各不相同，很难协调一致。除了因这些高技术自身的特点难于控制以外，世界各国对于这些发展高技术的政策、管理规范各不相同，也难以很快地建构一个非常严密的切实的规范的管理体系。尽管世界各国可能就人类根本的生存利益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范围内达成某种控制优生学技术的共识，但是这些危险技术的行为受到禁止之后，那些开发者会想法把它转移到其它国家或

地区去。即使这些国家也加入了国际上共同的禁令队伍，但是由于自身的经济、政治利益，可能会允许发展这些受到国际禁止的技术。何况这种技术转移远比原子能技术和污染工业的转移更难发现，即使原子能技术和污染工业的转移在国际上是受到严格禁止的，它们照样在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因此，在各国之间完全控制和禁止这些后人类技术就更为困难。虽然我们指出了上述高技术调控和管理的实践困难，甚至还有许多出乎意料的种种困难，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实践中就无能为力，只能听任事情的任意发展，只能接受它的结果，而是应该强调和正视这些困难，努力去寻找应对之方。

五、几点警示

通过上述对后人类主义价值观的批判性探析，我们得出以下几点重要警示：

第一，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日益突出的重要作用导致不少人将技术视为无所不能的东西，如果说过去人们曾经相信“技术是带来解放的上帝”，现在后人类主义者则把高技术当成超过上帝能力的“现代技术图腾”。他们认为，依赖于高技术的发展，世界上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技术不仅在改变物质世界方面超过了上帝，而且在人性规定方面，也改变了上帝造人时给予人疾病、寿命、能力等基本规定，以至于马克斯•莫尔说是在“玩上帝”。[4]这种认为技术决定一切，技术上能实现的就是对的，以技术为评价一切事物和人类行为的标准的看法，是一种极其错误的价值观。它忘记了，作为人类实现自己美好生存的工具和手段，技术具有它的属人本性。尽管技术具有改变世界的巨大能力，也具有相对的自主发展规律，但是技术最终是一种工具价值，是一种手段善，而不是目的善。它是为了人并服务于人的，它的发展应该取决于人的需要和利益等目的价值。因此，必须确立技术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长远利益服务的根本目的性价值，反对能够发展什么就发展什么，反对完全由技术的可能性和经济利益引导的技术发展。必须树立技术发展依赖于社会文化指导和法律、道德调控的思想。

第二，高技术的开发和利用给人类带来的利益和危害都非常巨大，尤其是将它用于改变人性的生物基础和智力时，更是难以估计其复杂性和长远后果。如果不加约束，任其自由地去发展，可能会产生一系列社会问题，导致社会阶层、不同民族和国家的不公平竞争，更有可能创造出新的人类物种，给人类生活带来毁灭性的灾难。人类不能盲目追求没有把握控制其后果的技术的发展。根据高技术目前在许多领域的发展来看，人们不能只看到高技术发展有利的一面，而无视高技术发展的巨大破坏性潜力。后人类主义盲目地相信，人类利用高技术的力量不仅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来控制世界，建造技术化的人间天堂，而且可以利用高技术来改变人类本身的进化方式，使后人类的智慧、能力、寿命、幸福超越任何极限而得到永恒的发展。这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和行为必须加以有效地管理和约束，否则将给高技术的开发带来难以预料的混乱局面，也将给人类的正常生活的秩序造成严重的威胁。

第三，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发展包括生命技术、智能技术等高技术是我们的一个重要任务。这不仅是因为高技术是我们经济发展的根本支撑，不发展就会受制于发达国家，更重要的是，高技术是提高人的素质，解除人的痛苦、实现人的幸福、保障人的尊严的需要。因此，我们应该有选择地发展这些高技术，而不能简单化地采取绝对禁止的态度。但是，在发展这些技术的过程中，我们需要从经济、政治、法律、道德等各个方面进行综合性的考虑，也需要结合自己的技术发展要求和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来制定我们的发展战略、对策和调控机制。对于这些利害关系极其复杂，后果极其难以把握的具体的技术项目，我们必须具有高度的责任心，必须健全对它们的评价、监督、追踪监测的机制，以便在发生意料不到的事故时，采取补救措施。同时，我们还应该积极参与有关高技术发展的政策、法律和伦理的国际性研究和对话，加入那些达成共识的相关的国际组织，以共同促进高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健康发展。

主要参考文献：

〔1〕]The Transhumanist FAQ. [J] http://www.transhumanism.org/resources/FAQv21.pdf.

〔2〕Max•More.On becoming posthuman.[J] http://www.maxmore.com/becoming.htm.

〔3〕曹荣湘选编.后人类文化，[M]，上海三联书店，第139页。

〔4〕Max•More.On becoming posthuman. [J]http://www.maxmore.com/becoming.htm.

〔5〕 参阅 B.Л.伊诺泽姆采夫.从《历史的终结》到《后人类的未来》——评F. 福山新著《我们的后人类的未来》，[J]文华摘译，《国外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

〔6〕参阅赫费.作为现代化之代价的道德，[M]邓安庆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216～223页。

Probe into posthumanism’s view of value in technology

SHE Zhengrong （Party School of CPC Guangdong Provincial Committee, Guangzhou, Guangdong510050, China）

Abstract：By applying modern high techs such as life technology and artificial super intelligence, posthumanism’s view of value in technology attempts to realize the improvements of humanity, to achieve human being’s limitless and liberal development in respects such as health, capacity, lifespan, happiness and so forth, and eventually to make human evolve to be posthuman existence, which ensue complex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problems related to human being’s existence and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This article has made practical and deep probes into these problems.

《自然辩证法通讯》2008年第1期

/